

■人物素描

拉宾将行为分析变成微观经济学主流

□史晨昱

主流经济理论是在简化市场参与主体行为因素的假设条件下构建起来的。随着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积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行为因素已显化为影响经济运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应运而生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不同参与个体通过行为表现与经济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行为经济学并非对传统的颠覆,而是有益的修正。行为经济学一直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以2000年克拉克奖(青年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颁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为标志,行为分析方法迅速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主流部分。拉宾的获奖也直接促进了丹尼尔·卡尼曼两年后摘得诺贝尔桂冠。

现年43岁的拉宾,1984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与数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起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1999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

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 不仅仅只是“自利”

拉宾从事研究之初,是一位致力于主流的博弈专家。主流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都是理性且自利的。拉宾认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不仅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观念等引导“社会目标”引致的成分。因此,他将社会动机的一种形式——利他或是人们对他人福利的关心纳入博弈分析中。1983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杰作“博弈经济学中的公平”。之后,拉宾将全部精力转入行为经济学研究,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拉宾的研究主要是以实际调查为根据,比较在不同环境中观察到的人的行为,然后加以概括并得出结论。

准贝叶斯理论。判断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是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例如,什么时候利率会上升?哪支股票会上扬?回答这些问题都伴随着概率判断的过程。按标准经济学原理,概率判断是基于统计样本的概念,并且在面对新事情时,我们不断用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预测概率以使之接近实际。所谓贝叶斯法则,是指当分析样本大到接近总体数时,样本中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近于总体中事件发生的概率。但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并不遵循贝叶斯规律,而是给予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以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判断时过分看重近期的事件。面对复杂而笼统的问题,人们往往走捷径,依据可能性而非根据概率来决策。这种对经典模型的系统性偏离称为“偏差”。由于心理偏差的存在,投资者在决策判断时并非绝对理性,行为会偏差,进而影响资本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力的替代工具,经济学家不得不



当人们处于一个不可能坚持下去的“白热化”情况时,他们会做出难以更改的决定,比如,车商的过分宣传会促使人们买下名车,热恋中的人们会马上结婚。由于人们低估了强烈感情的影响程度,他们很可能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冷静阶段”就是要求人们在做出这些决定之前拖延一会儿,或许能纠正这种错误,使人们不至于产生过分的预测偏差,并不至于做出让自己后悔不已的决定。

在分析中坚持贝叶斯法则。拉宾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准贝叶斯理论,即假定人们虽然错误指定,或者错误解释一系列假设,而使用的却是标准的贝叶斯规则。拉宾用确定性偏差(confirmatory bias)加以证明。模型认为,一旦人们形成先验信念,就会有意识地寻找有利于证实自身信念的各种证据,而人为地扭曲新的证据。那些相信假设A比B更好的人会始终坚信A更好,甚至有时会支持A而错误解释B。例如,不论股市涨跌潮落,一些基金经理常年坚持“价值”投资策略,而另一些基金经理常年坚持“增长”投资策略。

小数定律 将产生“赌徒谬论效应”

小数定律。在准贝叶斯的框架下,拉宾进一步提出“小数定

律”(the law of small numbers)。人们往往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事件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即以小样本特征反映总体特征。拉宾向人们展示了这种信念在金融、证券和管理等领域许多令人惊奇的结果。小数定律将产生“赌徒谬论效应”,或者反向调整的“平均法则”。赌徒谬论是指在一个独立的样本里,人们预期第二次抽出的信号与第一次抽出的负相关,即人们预期第一个结果的出现增加出现第二个不同结果的可能性。比如说,随便从口袋里拿出一枚普通硬币,如果抛了3次都是正面朝上,人们会说“下一次一定是反面”。他们认为,即使抛硬币次数很少,也应看到正反面出现机会大约各占半数的结果,因此必须有更多的反面来平衡这么多的正面。其实即使连抛3次都是正面的话,下一次出现正面的机会仍然是50%。事实上,人们在某个彩票号码中奖后接二连三的时间里,都避免再在那个号码上下赌注。再如投资者在三年的多头市场之后预测会过度悲观,在三年空头市场之后预测会过度乐观。

贴现率是 时间不一致的

时间偏好。经典金融理论在时间偏好问题上不考虑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差别,即不同时间的贴现率都是一样的。拉宾则认为,贴现率是时间不一致的。这涉及我们怎样权衡一天与第二天的问题。如果要去做一件事的时间是第300天和第301天时,人们通常把这两天看成一样。但当这两天就是今天和明天时,我们极其在意今天的处境。如果你在今、明两天之间做出选择,你会倾向于今天就去去做一件愉快的事,而把不愉快的人物拖延到明天去做,即使这种拖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人们会因为拖延戒烟、节食或是体检而影响寿命。拉宾进一步论证,相比未来福利,人们更重视现有福利。这意味着,在每个时段,一个人会比任何先前时段更加追求即刻的满足。抓住这一特征,拉宾描述了人们储蓄行为中的“夸张贴现”现象。他认为,当预期有金钱收入但尚未收到时,人们能相当理性地在消费和储蓄上规划。在有限的刺激下,人们愿意储蓄和推迟开支。但是当钱真来了,人们的意志便崩溃了,钱往往立即被花掉。这是因为,人们的时间偏好中,短期贴现率往往大于长期贴现率。

损失规避。标准经济理论中,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会将期望效用最大化,而且往往是将各种不确定结果中的效用加权平均后再得以最大化。通过心理学实验,拉宾发现了与期望效用理论不一致的一些结论。传统经济学中对于风险、损失或

获得金钱的态度,都是有关绝对水平的。但实际上人们更在意变化,而不仅仅是绝对水平。人们通常更为关注财富的变化情况而非财富的绝对水平,而且对于一个给定的财富水平参考点,人们对财富的减少(损失)比对财富的增加(收益)更为敏感,即具有“损失规避”的基本特性。这显然比期望效用理论能更好地解释了人类行为。

以强制性“冷静阶段” 纠正预测偏差

预测偏差。如果饥肠辘辘地冲进食品店,你会采购更多的食物,偏向过度消费。但既然这个道理众所周知,为什么这种现象会长期存在?拉宾认为,因为人们常常低估了自身行为和和外生变量对未来效用的影响,从而夸大了未来偏好与现在偏好的相似度,由此产生了预测偏差(projection bias)。拉宾分析说,一个人的现在福利不仅受其在消费的影响,还受到他过去的行为,偏好中暂时的变动以及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当他在会使其偏好发生改变的环境中面临选择时,肯定会预测未来的变化如何影响他的未来偏好。

拉宾规范了人们对未来效用的预测偏差的含义:人们倾向于低估

其状态中的变化效果,从而错误预测未来偏好,导致动态选择环境中的系统性偏差。他强调,预测偏差是广泛存在的,而且产生预测偏差的环境是多样的。人们常常低估了偏好中短期的短暂变化,或是缓慢发展但长期存在的变化,以及不依赖于先前预测偏好的变化。拉宾由此提出应让消费者有一个在决策前的强制性“冷静阶段”。他提出,在很多情况下,当人们处于一个不可能坚持下去的“白热化”情况时,他们会做出难以更改的决定,比如,车商的过分宣传会促使人们买下名车,热恋中的人们会马上结婚,当人处于极度绝望时会自杀等。由于人们低估了强烈感情的影响程度,他们很可能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冷静阶段”就是要求人们在做这些决定之前拖延一会儿,或许能纠正这种错误,使人们不至于产生过分的预测偏差,并不至于做出让自己后悔不已的决定。

年轻的拉宾早早登上了学术巅峰。与年龄相称的是,他喜欢明快的色彩。他的办公室摆满了色彩斑斓的写字笔和玩具。他制作的课件也总是五颜六色。在闲暇时,他喜欢身着花哨的T恤、哼着鲍勃·迪伦的民谣摇滚游走在电报大道的服装店间。

■本期人物话语

发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是商行战略选择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5月10日在北京由工行与香港贸发局合作举办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论坛”上说,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调整经营结构、分散经营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商业银行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本回报的内在要求。



■多声部

分配不公 成为国资流失黑洞

李金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近日赴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出席该公司2007年度审计工作会议提出,国有企业内部分配不公与不规范改制、关联交易等并列成为五大国有资产流失“黑洞”:第一是国企改革过程中,有些企业的转让卖出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第二是利用主辅分离,逐步把一些优质的国有资产分离到辅业中去,主业的管理人员在辅业参股甚至控股;第三是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关联交易问题;第四是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损失浪费严重;第五是非经济类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基地,大量的财政补贴等的流失。

中国城市生态功能太脆弱

贾治邦(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林业局局长)5月9日在第四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开幕式上表示,目前中国城市最短缺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柏油马路,而是生态产品。城市功能中最脆弱的是生态功能,这已成为中国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的主要差距。由于缺少森林,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噪音、粉尘、热岛效应等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居民享受的生态产品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很多城市的整体规划中缺少城市森林和城郊森林建设内容,这对提升城市的整体功能与投资环境十分不利。

收费项目管理应尽快立法

曹长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司长)日前在收费统计工作座谈会上说,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收费管理法律,有关收费的各种规定,散见于各专项法律法规中,行政审批仍是设立收费项目的主要途径。收费项目的设定,应当以法律为依据,而不是以行政审批方式设立,行政审批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干扰。依法设定收费项目,可以使每项收费都有明确的依据,真正反映公共服务的性质。要加快收费管理立法进程,逐步过渡到依法设立收费项目。没有法律依据的,不得通过行政审批立项。收费标准的审批,也必须依法进行。

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杜鹰(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近日接受《中国投资》专访时提出,认真学习领会两个中央1号文件的内容,可以进一步明确“十一五”时期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一是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二是通过明显改善农村的整体面貌解决“三农”问题;三是通过扩大公共服务覆盖农村的范围解决“三农”问题;四是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生产力来解决“三农”问题。从中央所明确的新农村建设的范围、内容和措施来看,基本上涵盖了上述思路所蕴含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新农村建设的“十一五”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和重大举措。

■经济思潮追踪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之外

发展中国家 非正规部门多种考察

□梁怡

提到“二元经济结构”,人们总会想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即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在同一社会中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城市中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形态和农村中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形态;传统部门主要指具有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低等特征的农业部门;而现代部门则指具有相对技术水平高、劳动生产率较高和收入高等特征的工业部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揭示了任何一个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概念最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经济学家们提出,最终在刘易斯手里成形,后来又经过费景汉、拉尼斯和托达罗等学者的发展而更趋于完善。

但是,在关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结构的同时,另一类二元结构同样不容忽视,它对人们在选择发展路径影响并不弱于前者。

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经济部门之间,也普遍存在于部门内部,尤其是技术和资本都密集的工业部门内部。在工业部门内部,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差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发展经济学家们专注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不久,另有学者开始关注工业部门内部的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二元经济结构。与刘易斯传统的二元部门不同,正规部门指的是工业部门内部要遵守政府各种规章制度、雇工受劳动法制约、须承担税收义务并以资本密集和规模生产为特点的现代化企业群体;正规部门在资金需求方面很容易得到金融信贷支持,但在其内部很容易存在寡头垄断和不完全竞争。而非正规部门指的是工业部门内部那些生产技术和方法简单、逃避政府规章制度管制、逃避税收和劳动法制约并以劳动密集和生产规模狭小为特点的企业群体;非正规部门的资金需求很难得到金融信贷支持,其所属企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

“非正规部门”这一概念最先由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Keith Hart提出,但最早展开系统研究的却是国际劳工组织。Keith Hart将非正规部门看作是城市中心正规市场以外的就业部门,这实际上囊括了正规的工资途径以外的所有谋生方式。国际劳工组织在1972年完成的就业报告中系统分析了非正规就业部门的特点,认为其主要特点是规避国家管制和税收,并肯定了它在增加就业机会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经过几十年发展,非正规部门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在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原因以及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学者们已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成果。

1980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J.C Breman在《非正规部门研究:理论与实践》(The Informal Sector in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中,认为工业化水平和生产率低以及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是发展中国家城市中非正规部门乃至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二元结构存在的原因。

1990年,荷兰经济学家Piet H Renooij在《非正规经济:含义、度量与社会影响》(The Informal Economy: Meaning, Measurement and Social Significance)一文中,从结构性因素和机会性因素两方面揭示了人们倾向于选择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原因:结构性因素包括人们所受到的资金压力、社会压力和制度限制等;而机会因素又包括教育程度、人际关系和生活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以及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个人背景因素。

1998年,Johnson S等美国经济学家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解释了拉美国家非正规部门存在的原因:高税收、法制不健全和腐败横行。

2002年,加拿大经济学家David Emerson提出,因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力度和范围会更大,也就是说,有更多寻租行为存在,它导致了更多的腐败,也使得发展中国家有更广泛的非正规部门存在。

关于对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关系的考察,学者们是从经济周期的影响这一角度展开的,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点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是逆经济周期的,在经济繁荣时期,正规部门获得发展,在非正规部门吸收大量劳动力;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工资刚性和生产成本增加,正规部门的生产规模会缩减,大量劳动力会从正规部门流向非正规部门,从而使非正规部门发展。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以世界银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Maloney为代表。他在研究了墨西哥的经验以后认为,确实会有一些非正规部门在经济繁荣时期因为劳动力转向正规部门而萎缩,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因为劳动力加入而壮大。但这部分非正规部门只占很小一个比例,而大部分非正规部门因其自我就业的性质而呈现出顺经济周期的特征,即在繁荣时期壮大而在衰退时期收缩。

对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二元结构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影响,因而在表面上看来前者似乎是后者的延伸和深化,但实际上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对前者的研究是对后者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尤其是在中国这样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区分明显的国家。

■来自日内瓦

股市暴热下面 有怎样一种经济底色

□徐小惠

中国股市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不光因为中国A股指数表现让人惊讶,并似乎预示着什么,而且这个市场的独特性也在引起包括经济史家在内的经济研究界人士的兴趣,这将是怎样的标本呢?

股市只是经济的一种表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傲视全球。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速度是否会继续?许多专家正在试图解答。而我还关心问题的另一面:中国经济是否会放慢?对于来自外部的打击,中国经济是否会很脆弱?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超常的经济增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风险和境遇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巴西的景况非常相似。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巴西吧。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巴西经济发展情形和现在的中国的确颇为相似,发展势头非常之好。但之后受到一系列金融冲击,

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及时处理好,在八十年代期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最终致使他们在20多年间创造的财富大部分化为乌有。所以,巴西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非常有借鉴意义。当然,现在的中国不是当年的巴西。我们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

有分析家称,中国经济尽管在短期内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平稳,但中国长期依赖高投资的做法是无法长时间维系的。这个提醒是有道理的。而正因如此,中国现在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段经济稳定增长的宝贵时期,抓紧实行更多有效的经济改革措施。因为,在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时候,改革相对比较容易。

我认为,从多项指标看,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势头,以及平稳的通货膨胀局面是可以维持的。比如,商品出口形势良好,FDI数据也乐观,工业经济表现以及景气度也在较好的水平,等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就长期而言,

那种依赖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发展模式存在许多问题。所以,在一个比较好的经济环境下,实施有效的改革是很重要的,这关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巴西20年前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

尽管目前尚没有明确下一步将会着手哪些改革,但是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持经济增长的平衡,以避免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因过度投资而造成大泡沫,更防止由此造成经济出轨。这是国际观察人士能够感受到的信号。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国人的高储蓄问题。中国的储蓄率相当高,而且老百姓的储蓄热情始终不减。但是,这样的储蓄热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所以,最近有不少人把钱转到证券市场去了。最近持续不断的存款搬家现象,很值得关注。从今年头四个月的趋势看,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地进入个人理财,已不是一个小问题了。